



大变迁与新趋势

历史文化背景与
石狮人的性格

文化作为一个社区人群独特的生存方式，千年演化，在石狮形成了一种具有很强吸附性和容纳性的文化发展机制。

石狮文化铸造了石狮人的性格。

他们乐天，不拘泥于小事；他们富于进取精神，不愿受他人支配；他们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可怕的商界对手；他们认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坚信“爱拼才会赢”。

改革开放以来石狮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瞩目，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被当作一种“模式”或“现象”进行研究。纵观有关的研究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注重分析经济本身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及资金的形成）在石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都开始注意到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一、文化背景：石狮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任何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类型的出现，总与该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离开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我们很难理解像石狮、温州这样的地方，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发展的这样迅速。但，迄今为止，把石狮文化与石狮经济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似乎还未见到。无疑，这是今后“石狮现象”研究中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Parsons）在其名著《社会行动体系》中，对文化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有过精辟论述。他把社会大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分别为：（1）负责调适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adaptation），（2）负责实现目标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goal—attainment），（3）负责整合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integration），（4）负责维持模式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pattern—maintenance）。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与外界环境调适，这是关系到个体与社会生存的根本问题。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特定的方式来应付和控制外界的环境。在帕森斯看来，经济系统即属此类，它是社会成员们设计

出来，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方式。同时，人是有动机的，社会也一样，每个社会都会形成共同意识，因此，为应付不时产生的动机，社会中就要有一套特定的系统以便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帕森斯认为，政治系统即承担这种功能。但是由于任何社会都有相当程度的分化，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分化的结果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在利益、信仰、态度、价值等方面产生分歧，为维持社会的共存状态，就要有一套特定的系统来负责，这方面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要原因，那就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有“社区（Community）”形态的存在。所谓“社区”，这里必须做最广泛的解释，“它是一种超乎单纯地域性社区外的东西，它包含着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绪投入、道德认同、社会凝聚，而且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的所有关系形式。”因此，“社区”即是一个负责社会整合的子系统。然而，在帕森斯看来，不管是与外界环境的调适，或目标的实现，或社会的整合，基本上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结果，也都是社会成员的创造品，它们都必须通过人类赋予特定意义，而以特定的形式来表现。即是说，无论生产模式、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或社区形态，最终都必须接受人的意识的指导，而反映人类的某种理念、信仰和价值。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套的制度来规范、修饰和发展理念、信仰、态度与价值。这种制度往往自成体系，帕森斯称之为“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具有使一个社会形成并维持其独特性格的作用。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成中国式的样子，即因中国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体系。同样，我们可以说，石狮之所以会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类型，即因石狮具有其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关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最为充分，影响也最大。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欧洲兴起，是因为欧洲人具有一种相当特

殊的成就动机。这种动机内涵在欧洲历史之中，基督新教伦理即是促发这种动机的历史原动力。他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伦理的区别。“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调适，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合理地宰制世界”。由于儒家着重与自然的和谐，讲天人合一，讲修己顺天，所以不能引出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变革的心态，这与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是不相符的。当然，传统中国人缺乏的其实并不是“成就动机”，问题在于其成就动机是偏于“人事学问”，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一窝蜂地往官场中挤。从这方面讲，韦伯的观念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我们在同意韦伯基本观点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如此之大，地域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且文化发展及人的性格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在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即是说，每个地方都可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系统与个性系统。这一点，古人早有论述。“邹人东近沂泗 多质实 南近滕鱼 多豪侠 西近济宁 多洋华 北近滋曲 多俭嗇”(《邹县志》)。“吾郡少平原旷野 依山而居 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这些讲的是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的性格的差异。“**蕲**春人性躁动 风气果决 包藏祸害 视死如归 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 其俗颇变 尚淳质 好俭约 丧纪婚姻 率渐于礼”(《隋书·地理志》)。“新安名姓聚而居，绝无一杂姓渗入者 其风最为近左 出入齿让 姓名有宗祠统之 岁月优腊，一姓村甲 千丁皆集 祭用朱文公家礼 彬彬态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这些讲的则是社会制度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古今说笔，有时代性 山川浑厚 有民族性”黄宾虹先生在其《九十杂述》中一语道破了中国文化的时空特色。因此，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化，并不

是毫无差异的铁板一块，而是由色彩斑斓的文化子系统构成的。我们以为要真正地认识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更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国文化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在实证研究中，地域文化应成为一个重点，尤其是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是当前文化学与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石狮社会经济发展类型中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具体研究石狮历史文化特性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的涵义进行一下界定。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文化是一个最常挂在人们口中，但也是用得最为松弛而混乱的一个概念。有人做过统计，从 1871 年至今，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不下 200 种。泰勒（Tylor）1871 年首次对文化进行界定：“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这个界定大体已涵盖了文化的基本内涵。即是说所谓“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所共同创造出的设计，它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实际上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属于行为的模式，其二是属于引导行为的模式。就前者来说，文化是指可观察的事件或事物，而具体的行为表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内容；就后者而言，文化是指具体的知识、信仰、价值或态度，它是社会成员藉以规范行为的模式并最终孕育选择的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鲁克洪（Kluckhohn）对文化作了更通俗易懂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存在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见克鲁克洪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说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

由此看来，文化是一个抽象的复合概念。在本文中，我们为了牢牢把握讨论的重点，不使讨论流于空泛，同时兼顾本研究的主题，我们还要对讨论的“文化”内涵略加围限。同时，要对我们的研究方法略加说明。既然本课题是有关石狮历史文化特性的问题，本质上即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既是经验性的研究，自然要涉及到经验资料的收集，写作也要以经验资料为依据，否则，信度与效度无法确定。但囿于篇幅，我们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对体现在石狮社会中种种日常可见的行为模式、生活设计一一加以罗列讨论，因此，我们打算把重点放在事实的描述，而是放在现象的内涵意义及其发生条件的解析。对一个社会学家而言，个人的动机固然是研究意向必须要关照到的，但他所关心的却不是一个个人的个别意向，而是体现在一个特定时空下一群人的意向倾向与其历史的变化。要对石狮人之意向倾向或生存式样有所了解，则不能不从其历史背景分析起。在具体的方法策略上，我们基本上依循韦伯（weber）之理想型（ideal type）的历史研究策略，于历史之中选取一些特定的表征，加以夸张理想化，由此提出能用来代表石狮文化的概念来，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石狮人的性格。至于条件的因果分析，我们往往讲的是“充分”的而非“必要”的条件。同时，当我们选择“条件”时，也尽可能以拟情的方式来推论实际行动者的意向，以此做为解释现象的基础。不管如何，本文对石狮文化的解析只是初步的尝试，许多命题应当只具有概率的性质，有些甚至只能看作是一种假设性的陈述，恰当与否，还有待于石狮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的进一步证实，也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二、石狮文化 四个子系统有机组合成的工商文化体系

前面已经分析，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社区的人群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套生存式样。依此，许多学者把文化划分成三大类型 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又称为海洋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但这并不能否认游牧文化（如北部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工商文化在中国的存在。近年来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将石狮文化归入工商文化之列。无疑 这与石狮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是石狮人在生存困惑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下面，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 对石狮的海港经济、私商传统、华侨社会、家族制度的变迁情况进行一下回顾。可以这么说，这种回顾是解开石狮文化，同时也是解开石狮之迷的钥匙。

（一）海港经济

就目前而言，石狮其实并不能称作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其港口经济及港口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必须从泉州的历史，以及泉州与石狮地区的关系讲起。石狮成为一个城市，不过才几年时间 如果离开了石狮的“母体”——小概念指晋江，更大点讲的是泉州，我们将根本无法理解石狮，更不要说石狮的文化。

泉州海港最早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其最辉煌的时代，是在公元12—14 世纪的南宋和元朝。当时的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根据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研究，古泉州港并非特指后渚这样一个单一的港口，而是指一个港口群，即由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等三湾中的十二个支港组成，其中包括现今石狮市管辖的蚶江、石

湖、永宁、祥芝四港。因此 在历史上 石狮地区是泉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是无疑的。

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原因泉州沿海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其港口经济的特征。从泉州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泉州背山靠海 平原狭小 耕地有限 港湾众多，发展农业经济的条件较差，而对发展海外贸易十分有利。从社会结构来看，继晋代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之后，自唐末五代，中原人口再度南移，致使泉州人均耕地开始减少，形成人与土地的矛盾。泉州史家王四达先生根据乾隆版《泉州府志》中有关人口和田赋的资料，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唐开元年间，泉州共有 37000 户，若以每户 3 人计算，泉州地区人口已超过 10 万人，按唐朝均田制算，一户一顷耕地，当时泉州应有田地 37000 顷，可是直到清朝前期 泉州耕地只有 14000 顷。即是说，泉州地区人多地少问题实际上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自唐以后，福建人口随经济开发而急剧增多，到北宋元丰年（1078—1085）间 泉州人口已超过 20 万户 南宋后期已上升到 25 万户 即使当时耕地有所增加 但可以认定 人与耕地的矛盾已更趋尖锐，粮食已经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虽当上熟仅及半年”^①，专仰南北之商转贩给以自给。宋代诗人谢屐曾在 一首诗中写道：“泉州民稠山谷瘠 虽欲就耕天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边 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清楚地表明宋代泉州单靠耕地 农业 已无法满足泉州人吃饭的问题，也无法容纳全体劳力的就业。突破单一的农业经济的圈子，在当时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然，宋元时期泉州海港经济的形成，还与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从东晋南北朝始，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进入唐代，由于西域一带经常发生战争，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北方中外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从国际贸易背景看，世界海上贸易开始兴起，阿拉伯商人开始从印度洋

来到太平洋开拓市场，触角已伸到我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因此，北方“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泉州地区由于偏安一隅，战乱较少，加上唐、宋、元等朝代对航海通商都采取鼓励政策，因而发展成为南方的重要商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农业经济的危机与海上贸易的兴起，逐渐改变了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近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自唐代以来，泉州经济就出现了向商工为主方向发展的趋势，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纺织、制瓷、矿冶、造船等行业已初具规模，其产品“远贩番国”，不远千里来泉州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为数甚多，呈现出一派“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到五代末，泉州港已成为一个南方的贸易大港。宋元时期，为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泉州的手工业门类更加齐全，技术水平更高，并且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如矿冶业的“打锡巷”，造船业的“船坊巷”，纺织业的“高锦铺”，造纸业的“纸邦”，以及制瓷业的晋江“磁灶”等等。王四达先生认为，无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所创产值，抑或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实际上已形成了以外贸为核心，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港口经济的特征。

石狮地区作为泉州的一部分，在整个泉州地区形成港口经济的同时，其经济结构也必然地被纳入港口经济之中。不仅如此，由于石狮地区属于沿海突出部，北有泉州湾，南有深沪湾，沿海环列着一系列的港口，加上石狮地区土地贫瘠，严重缺水，更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其经济结构的外向型当更为明显。据史料记载，宋时泉州港兴起，蚶江、永宁、祥芝等港澳成为泉州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朝廷在石湖、永宁建有水寨，富商巨贾、官宦望族陆续迁居其地。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僧祖慧募捐巨款在石湖村宝钗山坳建立六胜塔；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石狮人又在宝盖山

上建关锁塔（俗称姑嫂塔），这两座塔作为泉州海上往来船只的航标，是石狮海港经济与海港文化兴起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沿海几个港口通往泉州城必经之地的石狮（今石狮市区），随着商贾往来的增多而逐渐发展成型。

然而自明朝以来，正当西方世界各国驶向海洋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寻找财富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却实行闭关政策。为了防止海内外势力相互勾结危及封建统治，为了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明政府执行了一种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海贸制度，对国内私人出海贸易严加禁止，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把尖底船改为平头船，把二桅以上的大船一概拆毁，对海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泉州港从此走向衰落。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但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于是来去匆匆，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明政府还对那些为冲破海禁牢宠、争取自由贸易的私人海外贸易商进行残酷的镇压，加上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一带的骚扰、掠夺，荷兰殖民者先后占据我国澎湖和台湾岛，造成我国商船“内不敢出，外不敢回”。到清朝，政府为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海商集团的联系，实行了比明朝限制私人海外贸易政策更为残酷的“迁界”政策，下令把沿海数里内的村庄集镇统统烧毁。这个时期，虽然因沿海村镇人口的大量内迁而使石狮集镇基本形成，以及乾隆四十九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而使蚶江一度繁荣外，总的来看，明清两代的闭关政策，造成了包括石狮地区在内的泉州港口经济的一落千丈，以至港口淤塞，外商离去，后来很多人竟不知这里曾是东方第一大港。

港口的衰落，使泉州地区经济也迅速地衰落了。有限的土地、养活不了众多的人口，百姓或离乡出洋、或揭竿而起，加上外族入侵，使泉州地区自元末到明清又到民国，常处于兵乱之中。到解放

后 由于这里面对台湾 又被作为海防军事前线 国家没有投资 港口没有修复, 贸易无法往来。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石狮的海港经济才得到恢复, 海港文化才得以弘扬,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 石狮的发展与海港的兴衰密切相关, 凡开关开港, 石狮经济就兴旺发达, 反之, 其经济发展就受影响。

(二) 侨乡社会

与石狮海港经济相联系的, 是石狮侨乡社会的形成。石狮人出国的历史最早起于何时, 至今未找到有关史料的证实。但关锁塔的传统, 说明远在宋元时期, 石狮一带就有人出洋谋生。据明朝何乔远先生所著《闽书》记载: “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 商人贩海久不至, 姑嫂登塔而望之, 若望夫石然……”, 因此, 关锁塔又被称作姑嫂塔。宋代以后, 石狮一带便陆续有少量人因进行海外贸易, 或因家庭贫困无以为生而漂泊南洋。石狮人大量出洋定居是在明清时期。明朝开始, “倭寇” 屡犯永宁 迫使人们相继移居海外。如《大仑蔡氏宗谱》载: “兵燹后 合族苦于倭寇 纷纷外逃出洋”。该家族于嘉靖丁未(1547 年) 即有人往吕宋定居。清顺治年间, 统治者强令永宁、蚶江、祥芝一带乡民“迁界” 其中大量界外乡民被迫逃往海外。《石狮镇吴氏族谱》记载该家族于乾隆廿四年(1759 年) 有人定居苏碌。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 迫使石狮经济破落 乡民们再次大量出洋谋生。辛亥革命后 由于军阀混战 土匪横行, 加上国民党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以及拉夫抓丁等原因, 出洋谋生的逐年增多。如钞坑村因逃避抓丁而往菲律宾的就有 40 多人。解放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石狮大量侨属、侨眷出国探亲、就业、定居海外。目前 旅居海外的石狮华侨、华人共有 25 万人 侨眷侨属占全市总户数的 80%, 旅外华侨、华人主要分布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日本、美国等 其中以菲律宾

为最多 约 20 万人 占 80%，其他国家为数不多，总计约占 20%。

石狮除了是著名侨乡外，还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但它孤悬海中 地广人稀 加上地理位置相近 成为石狮人外移的绝好去处。明嘉靖晚期到万历年间，政府的“海禁”政策断绝了人们的生路 稀少而瘠薄的土地 繁重的徭役 使得人们不得已铤而走险。而此时活跃于海峡之间的“海盗”集团 为移民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万历（1573—1620）年间，明王朝迫于形势。“海禁”开始松弛，一时前往台湾的渔舟商舶大增，移民也随之增多。到万历末，据施琅说“其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不下万人”。明天启（1621—1627）年间，汉族移民已遍及全岛。大约比荷兰人占领台湾稍早，“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就以台湾北港为基地，活动于海峡间，并在台湾行使着政权职能。第一次移民高潮就在此时出现。天启六年（1626）前后直到崇祯四年（1631）之前，福建沿海严重干旱，郑芝龙以“劫富施贫”为口号，招纳流亡，沿海饥民纷纷投奔郑氏，一时聚会数万人。郑芝龙归顺明政府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出资以优厚条件招饥民赴台垦荒，当时石狮也有很多饥民跟着前往。如龟湖村铺锦黄就是在这个时期移居台湾开垦了台湾铺锦村，还有永宁的高姓也同时移往。第二次移民高潮，是在 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郑抗清时，曾于石狮蚶江后垵澳设“水操寨”，所以石狮人民曾大力支持过郑氏，有很多人还跟随郑入台。如蚶江人薛祖武、林昌商等将领就曾率领蚶江水兵留台开发，并在台北设有“三怀堂”（即蚶江王、纪、欧阳三姓怀亲堂），至今获存。此后清政府实行“迁界”，迫使石狮一带乡民流离失所，或东渡台湾，或漂泊南洋，此间蚶江的林姓迁台最多。第三次移民高潮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偷渡，但“例禁虽严而偷渡接踵”。特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蚶江对渡，乾隆五十七年，又开台湾八里坌与

蚶江对口通航。这期间，石狮沿海一带移台的人数颇多，单石壁村林氏迁台就达 40 多人，锦江、石狮、永宁等村移台的也不少，其中石狮洋坑村蔡氏迁台后开拓了现台北的小洋坑村。目前台湾同胞中祖籍石狮的大约有 30 多万人，居住在石狮的台湾同胞有 200 多人。石狮人移居台湾以后，除了解放后近 40 年间由于政治原因，两地人民不能正常往来外，石狮与台湾两地的交往一直很频繁，代代相沿不衰。

当石狮人于 18 世纪较大规模移居海外的时候，南洋一带已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西班牙人于 1571 年占领了吕宋岛。移居菲律宾的华侨，开始时以厦门、漳州人为多，但 1603 年和 1639 年，西班牙殖民者两次对华侨大规模屠杀，被杀的中国人达 90% 以上，从此漳、厦移民多视菲为畏途，其后往菲定居的以泉州地区人民为主，其中以晋江、石狮人为最多。与西方列强的移民方式不同，中国人移居南洋基本上是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流落他乡，他们不是去攻城掠地，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讲，华人比西方列强在南洋所占的优势本来更多些，菲律宾群岛就在近旁，中菲之间的海域畅通无阻，华侨在数量上也远比西方列强为多。但是，西方列强东来得到其帝国势力的支持，他们不仅有国家法律和 political 的保护，而且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而华侨都是被官方遗弃的地位卑贱的商人，他们移居海外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斥为“自外王化”的“薄民”，处处受到政府的压制。本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谋生，是十分痛苦的，也是十分艰难的，若非生活所迫，有谁愿意离开故土，又有谁愿意去“违法”去冒险呢？深深何为者，西来渡海人，银铛杂贯索，一队一酸辛”；“宁知是偷渡，登岸祸及身”。在出洋过程中丧失性命的，不知有多少人，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到了海外，举目无亲，孤立无援，面对全副武装的西方殖民者，他们在经济上也无法与之竞争。如果能

力与胆量来衡量的话，华侨能够做西方人所做的一切，然而尽管他们在海外拼力，有的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却无法在国内促成必要的制度变化与欧洲势力抗衡，他们从来不是清朝政府建立商人帝国的势力工具，也不能指望经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官方的援助或是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他们是“没有帝国的商人”。这一切决定了海外华人在谋生中必定要比别人付出百倍的艰辛和经受百倍的磨难，决定了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必定要更多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

海外华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世界华商大会讨论发展经济和弘扬中华文化问题时提出的，是“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信任和相互扶持。简单说来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勤俭和刻苦耐劳是海外华人立足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靠的是海盗掠夺，华人赤手空拳出国，最早的一代都是出卖苦力的受剥削者，他们后来经商的资本，全靠在低廉工资下加班加点和节衣缩食攒积下来；由于刻苦耐劳，华人比其他民族的移民更受到雇主的青睐，只要有人雇请，就有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因为勤俭，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就较低，就比较容易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在困难中立足发展。当他们积累了些许资本后，就由雇佣工转为小企业主，靠着中国人的传统技艺，从小食店、小杂货店、洗衣店、理发店开始他们的商业活动。因此，有人总结说，南洋华人靠“三把刀”（即菜刀〔餐馆业的代称〕、剪刀〔制衣、洗衣业的代名〕、理发刀〔服务业的简称〕起家。直至今日，餐饮业和制衣业仍是南洋华人所经营的重要行业。从事这些行业，没有刻苦、勤俭的精神是根本无法致富的。

诚与信、尽心服务的精神是海外华人生意成功的根本。华人移民是民间自发进行的，他们定居南洋，只为谋生，不偷不抢不骗，更不想夺人之国，他们到各国去，都是先创造后获取，他们以“和为

贵”为处世哲学，以诚和信为经商根本。香港德辉集团董事局主席蔡淑好女士，1974年从石狮移港定居，她当时身边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1岁。她从接缝纽扣开始，继而搞印花、搞小百货，就靠诚与信，靠货真价实积累资金，也搞好银行的信誉。有一次她了解到打火机生意可做，便从2万元订货开头，做了泰国公司的代理商，1985年取得韩国最大打火机生产厂商三个半独家代理权，继而生意扩展到房地产等行业，年营业额从十几万元发展到上亿元。

重视子女的教育也是海外华人的突出特点。第一代华侨大多读书不多，因此许多人吃了苦头，他们只要有点积蓄，第一件事便是送子女入学读书，学好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反过来促进企业发展。祖籍石狮的菲律宾超级富豪郑周敏培养女儿郑绵绵就很有眼光，除了学历之外，郑周敏着重培养子女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实践经验。郑绵绵15岁中学毕业后，父亲就安排她到属下的农工商发展公司做事，从练习生、打字员、业务员做起。在父亲严师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倔强的郑绵绵，白天做工，晚上坚持在女子大学念商业会计专业，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19岁，父亲就让她管理一个拥有1500人的纺织厂，24岁就让她担任亚洲世界集团的董事长，终使郑绵绵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大企业家。

海外华人状况如何，还与所在国政府的政策有关。1965年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对华侨的政策有所改变，由原来的排斥、限制转为利用、宽容，想借助华侨、华人的财力，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同时想通过菲华侨与港、澳、台华人的商业关系，引进外资，发展经贸关系，改善菲国的经济状况。在此大背景下，大部分华侨归化为菲国公民，菲律宾华侨经济开始向华人经济转变。华侨加入菲籍后，得到参予经济生活的合法地位，能够在较公平的条件参予市场竞争，可以在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发挥自己的商业才能，华侨

华人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在菲律宾的石狮华侨、华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许多已成为当地工商界的巨头，有些发展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乃至世界级的大富豪。

由于历史与血缘的关系，生活在境外的石狮华侨、华人后代、港澳台胞的乡土观念很强，他们甚至把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也搬到海外，每当国内政治比较稳定，政策比较宽松时，他们就纷纷回来投资建设，而当家乡危难之时，也不惜倾囊相助。据 1958 年 12 月晋江县华侨企业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1901 年石狮就有旅菲华侨蔡玉尔与人合股开设的布店，1914 年旅菲华侨回乡独资开设了百货商店，1919—1937 年，这一阶段由于侨汇大量涌进，因而许多华侨纷纷在石狮投资兴办钱庄、百货商场、旅社及各种商行等，约 200 多间。随着商业的繁荣，交通业也大为发展。1925 年泉安汽车公司在石狮设车站，1926 年至 1927 年华侨投资开辟泉州经石狮到金井、围头的公路，1930 年到 1933 年兴建石（狮）永（宁）蚶（江）线、石（狮）东（石）石（狮）浦（内）线，交通的发达使石狮成为晋江沿海侨乡的商品集散地，成为晋江侨乡消费的中心市场。与此同时，华侨捐资用于购建房产的不少，改革开放前石狮镇内的房屋中约有 70—80% 是华侨于 20—40 年代兴建的，如大仑街与福建路的许多店面，就是附近大仑村的旅菲华侨兴建的。解放前留下来的街道有 26 条，面积约 50 多万平方米，大多数是石狮和周围华侨的私人财产。此外，石狮海外华侨捐建公益事业的很多，除修桥铺路外，主要是为家乡捐资办学。自 1901 年永宁创办行实小学起，石狮华侨办学蔚然成风。1912 年到 1919 年，华侨先后在永宁、祥芝创办竞新、永明、子英等小学，在石狮周围办爱群、彭田等 12 所小学，永宁也办有银江、梅林等 7 所小学，蚶江有锦江小学等。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石狮侨办中学共有 2 所，侨办小学 55 所。石狮建市以后，侨务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侨乡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据初